

· 中国式现代化研究 ·

总体秩序观: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文化逻辑

刘占虎

摘要:现代化是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必然,作为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具有时间意识的结构性变迁,内蕴着深层次的秩序重构和意义建构。基于现代性的一元性和现代化的多元性,民族国家的社会转型和结构变迁总是蕴含着特定的制度—文化逻辑。为生存斗争和为幸福努力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主题,建构优良公共秩序和有尊严的幸福生活是现代化的旨归,在生存论层面涉及自然秩序和客体向度的社会关系,在幸福论层面涉及心灵秩序和主体向度的社会关系。二者共有的对象化关系在秩序意义上表征为制度建构及其内在的观念变革。基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实践是重构现代性秩序的中介,而制度—文化则是建构合乎人性的自然秩序和合乎自然的心灵秩序的中枢。中国式现代化作为重撰西方现代性的范式革新,在制度文明上孕育着人的全面发展的总体秩序观。基于总体改革观和总体秩序观的政治哲学分析,有助于从整体实践观视野阐明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性的结构性超越,将各种增长主义的发展叙事聚焦到人的全面现代化上来,以文明进阶的历史意识建构优良公共秩序和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关键词:现代性批判;制度—文化;总体秩序观;总体改革观;中国式现代化

从历史哲学的视界看,现代化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具有时间意识的结构性变迁。现代化作为世界历史生成和建构的必然趋向,是人类必须面对的生存境遇。从多学科视角探析“现代现象”的“现代学”经过数百年的知识积累,在发展逻辑上深度表明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即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在时空变革中的生命叙事和意义建构。走向现代化是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赢得历史主动和引领时代潮流的必然选择。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不断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着力建构优良的公共秩序和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当代中国的总体改革观孕育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秩序观,形成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制度—文化逻辑。现代化作为历时性地建构人类优良生存秩序和包容性发展格局的方式,有待于对现代性的复杂镜像予以批判分析和比较研究,阐明中国式现代化内蕴的社会主义制度—文化逻辑。为此,基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生存秩序和幸福确证展开对象化关系的结构优化,为阐明当代中国总体改革观内蕴的总体秩序观提供本土化的分析框架,为重撰现代性的建构进路提供具有未来学的方法论。

一、现代性前提批判与资本现代化的秩序危机

一般来说,现代化是现代性的质态生成和建构过程,“我们将现代化界定为一系列大规模变迁过

收稿日期:2024-07-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2BKS068)

作者简介:刘占虎,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研究。

程的总和,通过这些变迁过程特定社会往往获得被认为是现代性所特有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特征”^①。现代性意味着稳定和质态,现代化潜藏不确定性或不稳定性。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生产变革、社会变革、社会加速等引发诸多的不确定性和社会风险,并衍化为难以掌控的秩序危机和人生风险。这些不确定性和结构性的秩序危机,是特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结果性表征。在前现代社会,尽管存在不同程度的社会变革和社会风险,但总体上是局部性或非结构性的。由资本逻辑展开的理性主义、技术主义、增长主义、物本主义、消费主义等促进社会结构及其观念形态的历史性变迁,同样,其中潜在的社会风险和秩序危机是结构性的。由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塑造了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和格局,特定的制度—文化逻辑及其潜在的制度悖论诱发了世界性的秩序危机。现代化的多元探索与现代性批判成为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双重镜像。当一种发展范式成为理论反思的对象,往往标志该范式的衰落或重新建构。对这一双重镜像的哲学反思,也就成为重构“现代学”的新使命。

现代性启蒙以理性化为先导,理性化由此成为现代社会的核心标识。就现代现象的认识论而言,本我意识的确然性构成认识与理性的出发点,“理性在本我的阿基米德支点上生成、演绎、展开、完善。本我与理性构成人类主体目的论,乃至先验理性目的论发展的两个中心因素”^②。现代是作为时间意识的观念界标,意味着对“传统”的祛魅和对“过去”的扬弃,“伴随着启蒙运动,历史思想整合了断裂的关键观念,并从循环的模式转变为进步的模式”^③,使现代世界被认为是一个向未来开放的世界。继神权政治祛魅之后,作为“理性”主体的人,通过革命化实践以“物的占有”为表征实现工业现代化,作为彰显人的本质力量和自由意志的确证进路。吊诡的是,人类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在激活物的创造力的同时沦为物役性存在。就思想形态而言,“我思故我在”意在表达人相对于上帝的理性意识,以理性“为自己立法”来表征人作为自主性存在的主体意识。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经济及其潜在物化逻辑,将理性意义上的“我思”转变为财产权意义上的“我占有”,因为“占有”意味着生存权益的秩序保障和幸福确认,在思维形态上表征为“我‘占有’故我在”。如果说神权时代的合法性论证是借助上帝意志的“他者化”确证,那么,资本时代的合法性论证是基于此岸世界和资本作为“回到世俗世界的上帝”来建构市民社会的秩序存在论。由此,资本作为一种增殖性的社会关系,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结构上革新了人类的生存秩序和幸福叙事。

日益增加的社会分化表现为人们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多元化。商品经济形成和发展是现代社会的界标,由科技进步助推的深度工业革命,将人类带入信息存在论的新境域。对物质产品和社会财富的“占有性”表征,逐步从所有权意义上的“占有”转变为生存论意义上的过程享有和符号体验。由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矛盾诱发难以克服的结构性的经济危机,生产—交换环节的价值确证逐步转向交换—消费环节的社会关系再生产。生产力水平不再是决定社会生产的单一要素,而是生产力不断进步基础上的交换方式的时空拓展和人们消费能力的再生产。商品经济作为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形式,是以社会分工和多环节的价值确证为基础。分工与确证的结构张力,在一定意义上促进消费社会的形成。在消费社会语境中,人不再是“占有性”的主体,而是成为社会再生产的“消费性”客体。换言之,消费的内容设定不局限于人的真实需要或合理需求,而是聚焦人的消费欲的激发和消费能力的再生产。相应地,“我‘消费’故我在”成为消费社会的观念意识形态。同样,在数字—信息时代的境遇中,生产—交换环节发生了时空意义上的结构性变革,交换过程与消费过程融为一体。消费的内容逐步由实体形态走向符号化,符

① [意]艾伯特·马蒂内利:《全球现代化:重思现代性事业》,李国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8页。

② 倪梁康:《自识与反思》,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13页。

③ [意]艾伯特·马蒂内利:《全球现代化:重思现代性事业》,李国武译,第11页。

号性消费的衍化使人们的消费行为走向去功能化,即“符号性体验”大于“功能性占有”。消费主义的勃兴和生活世界的符号化确证使“现代人”沦为工业社会中的物化要素之单向度存在。

科学技术的进步与资本主义的驱动力内在耦合,成为现代性的内驱动力。科学技术革命使信息成为一种“非物”^①的实体,“我们今天正处在从物时代向非物时代的过渡,并非物,而是信息在规规定着生活世界”^②,在话语形态上抽象为信息本体论或数字存在论。科学技术作为一种通向自由的解放性力量,其力量之源恰恰源于自身的矛盾,这一矛盾延伸至生活世界,必然潜在“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对立”^③。“数字—信息”成为物质生产和社会消费的直接中介,“当今世界越来越像激光束的全息图,在这个全息图中每一点都包含着整体的信息,因为每个人都越来越倾向于消费来自任何地方的信息和资源”^④。数字化秩序被信息支配(宰制),数字化声响压倒任何大地之物的声响。人们对“数字—信息”的“占有”成为确证生命意志和幸福自由的重要向度,因为物的信息内容比物的使用价值本身更为重要。人们在“数字—信息”的生活世界中将“占有”内在化,数字化生存秩序要求“占有物”成为能够填充人们心灵内容之情感和回忆的容器。

数字—信息的碎片化和全周期覆盖,使作为“整全的人”在多环节的价值实现和消费确证中沦为碎片化或原子化的存在。在时间加速的加持下,作为人的整全的身体无法抗拒对诸多数字—信息的占有性困扰,时间加速与空间感的撕裂形成一种新的生存困境。由于过量的“肯定性”占据统治地位,无节制地追求效能提升而塑造的“功绩社会和积极社会导致了一种过度疲劳”,源自“功绩社会的倦怠感是一种孤独的疲惫,造成了彼此孤立和疏离”^⑤,即由时间加速和空间撕裂引发人们对时间存在的真实性的幻觉。在观念形态上,从“我‘消费’故我在”走向“我‘体验’故我在”的生存论叙事。可以说,“信息资本主义展现了资本主义的一种锐化形式。不同于工业资本主义,信息资本主义将非物质性的事物也变成了商品”^⑥。作为在特定时空中的体验,由于数字—信息供给的时空加速并引发结构性撕裂,让人对生命存在的时间感趋于钝化,无以真实地感受生命之“此在”。由此呈现出“我在”又不全然“实在”,“我占有”又不全然“体验”,“我体验”又不保全“完整”的情形。于此,以社会关系为中介引发自然秩序和心灵秩序的结构紊乱。物质丰裕未必指向人们的生存状态之良好,多维度的物化确证不等于人们的幸福样态。由此表明西方现代性的秩序逻辑无以通向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无以确证人作为整全存在的秩序需求和生命意义。

经典现代化理论对后发国家现代化的“同质性”阐释,形成“现代学”的西方样本。以“世界体系论”“文明冲突论”“依附发展论”为代表的理论范式,内嵌特定的西方逻辑和话语思维,无以阐明其他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身份和坐标。一是就民主与自由的关系而言,现代工业社会的民主尽管摆脱了专制权力和传统社会的治理模式,但资本主义民主作为私有制的政治化表达,维护的是少数人的自由权利。列宁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⑦二是就民主与秩序的关系而言,作为功利原则的民

① 自然界意义上的“物”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栖息地,“非物”不是“物质—意识”意义上的“非存在”,而是指内嵌于现代“生活世界”中的作为宰制性载体的“数字—信息”。人们经历从“对物与日俱增的兴趣”到“将物提升为理论反思的对象”的现在性历险。文化科学中的“物质转向”是基于信息革命和数字化生存的存在论革命,这一意义上的“非物”作为一种后真相时代的理论洞见,一是表达现实地去质料化和去物化的思想反映;二是表达对“数字—信息”拜物教的批判意识。

② [德]韩炳哲:《非物:生活世界的变革》,谢晓川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23年,第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5页。

④ [意]艾伯特·马蒂内利:《全球现代化:重思现代性事业》,李国武译,第159页。

⑤ [德]韩炳哲:《倦怠社会》,王力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54页。

⑥ [德]韩炳哲:《非物:生活世界的变革》,谢晓川译,第28页。

⑦ 《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1页。

主意味着正义制度的确立和法律政策的实施,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民主化有助于建构优良公共秩序和促进世界和平,但也会引发社会动荡的民主化危机。20世纪中叶以来,现代化与市场化、自由化、民主化伴生,民主化由此成为评估民族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尺。三是就民主与发展的关系而言,现代社会是人民创造历史的政治建构,民主化是文明社会的内在要求和重要表征。政治民主化意味着传统政治的现代转型,包括制度、理念、文化、科技、生活的现代化等。就现代社会的总体变革而言,社会转型是价值转向的样态表征,价值转向是社会转型的向度定位。转向作为一个中性意义的表达,并没有明确阐明其前提预设和经过思想论证的未来向度。

在经典现代化理论中,现代化在“现代学”的知识论上设定为“普遍化”的解放事业。人类现代化具有世界历史生成的一般规律和普遍性特征,“现代化的共同方向是通过创造性破坏的过程走向创新和无休止的变迁、社会结构的日益分化(经济生产和分配从家庭与社区中分离出来,政治和宗教分离开来)和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的形成”^①。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主要采取政党治理,政党的发展与现代政府的发展平行。亨廷顿将政治发展视为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的日益制度化,并通过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一致性予以检验。民族国家的民主化水平表征为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而政党及其政党体系是组织政治参与的首要保证。在这一思维框架下,基于公民社会的政治参与是民主化的核心动力。政治参与过度或动员过度,就会引发经济社会秩序的混乱。后发现代化国家由于单向度的民主化运动引发一系列的秩序危机,不得已又复归于权威主义的治理模式。亨廷顿关于政治参与、政治民主化与秩序稳定的模型,主要用来分析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秩序和稳定问题。一是就传统政治模式的现代转型而言,在传统体制延续性的政体中,“强大的政党组织是唯一能最终排除腐化型的或普力夺型的或群众型的社会动乱的选择”^②。二是就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体系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而言,“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那些在实际上已经达到或者可以被认为达到政治高度稳定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至少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③。多年来,不少论者引用亨廷顿的观点来佐证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党主导逻辑。置于知识论的语境来考察,就会发现其中有一个隐匿式的前置思维,即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知识预设。这意味着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需要强有力的政党或政党体系。一是能将西方的民主化模式予以本土化“复制”,以体现现代性的西方逻辑。二是通过政党和政党体系促进政治共同体建设,以避免民主化的“回潮”。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知识论批判,也就逐步走向审思现代性何以为一元性的知识论前提,以及人类走向现代化的多元化叙事。

现代性作为现代化的内在规定,在生成向度上具有未完成性,在功能向度上具有双面性。西方现代性危机源自资本逻辑主导的物的无限增殖的制度文化逻辑。资本逻辑是马克思解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范畴,也是构成其制度逻辑和观念形态的基底。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重要标识,但作为现代性的动力结构并不限于此。理解现代性的症候和现代化的多元进路,需要总体把握现代性生成的动力结构及其潜在的内在矛盾。从社会变革的大历史观的视野看,现代性作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内在规定,尽管在价值逻辑上隐含对“过去”和“传统”的贬低,但依然是揭窳现代社会制度文化变迁的关键。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揭示“历史之谜”的历史科学,是理解复杂“现代现象”的思想密码。生产力发展经由生产关系推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结构变革,是揭示“历史之谜”的关键。从生产关系和

① [意]艾伯特·马蒂内利:《全球现代化:重思现代性事业》,李国武译,第15页。

②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9页。

③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第341页。

交往关系层面揭示现代社会变革的一般机理,是理解现代性症候的重要切入点。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动力机制而言,主要是科学技术无限地运用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市场机制(工具理性)无限地推展至所有的领域,在此基础上实现生产力和经济的超增长。作为对现代社会变革之一般规律的揭示,意在从中性意义上揭示现代社会变迁的动力机制。然而,在资本逻辑主导的社会形态中,这一动力机制在时间和空间中全面拓充开来,造成现代性生成中的秩序紊乱或价值错位,具体表征为自然秩序、社会秩序、心灵秩序的结构紊乱,由此给人类可持续的生存秩序和幸福确证带来新的困扰。以未来学视野求解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发展难题,也就需要另寻重构现代性的结构性破解方案。然而,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叙事和知识论,在制度文化逻辑上阻塞了这一出路。

二、现代化多元叙事与总体改革观的中国逻辑

现代化尽管是趋于同质性的全球化过程,但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或模板。在此意义上说“通向现代化的不同路径与社会和政治系统模式的多样性是由外部影响与内部动力、经济进程与社会结构、政治制度与文化态度之间的复杂互动所触发的,这种互动产生了多重现代性”^①。每个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选择需要遵循特定的历史逻辑、政治逻辑、制度逻辑、文化逻辑、发展逻辑。这是现代性之“一元性”与现代化道路之“多元化”的历史辩证法。就现代化的制度逻辑来看,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之于工业文明的发展范型,开创人类超越“人的依赖性”的社会变革和制度革命,形成以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为表征的制度文化秩序,即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这一秩序形态就是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人类生存境遇。就人类文明进阶而言,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在工业文明基础上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扬弃资本逻辑的基础上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性占有,旨在建构人类文明进阶的共同体秩序。

近代以来,中国在内部矛盾和西方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以被动方式融入了世界历史进程。百余年来,经过现代性思想启蒙和现代化道路的探索,逐步形成现代化叙事的中国逻辑。在这一过程中,以世界历史理论为底板,通过比较经典现代化理论,汲取传统治国理政的积极要素,形成支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改革观和总体秩序观。比较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始于“后发—外源式”,并归于“自主—内生式”,在“现代学”的叙事结构上具有“中西古今”的时空特征。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性分析,重在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思维,历史性地超越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及其知识形态话语。事实上,人类走向现代化从来不是单选题,“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②。这一意义的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中国历史文化母版的简单延续,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模板的简单套用,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如果说“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对传统加以改造使其在功能上不断适应现代性要求的过程”^③,那么,中国式现代化则是基于文明借鉴和文明更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其中蕴含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赋予人类现代化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发展逻辑。一方面,作为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通过文明更新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另一方面,作为适应人类文明发展的高阶现代化,通过文明比较和实践创新,形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制度—文化逻辑。

历史地看,现代化是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必然选择,是中华民族赶上时代的历史选择。如果

① [意]艾伯特·马蒂内利:《全球现代化:重思现代性事业》,李国武译,第40页。

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14页。

③ 徐宗华:《现代化的政治文化维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6页。

说“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进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里的变革”^①,那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由中国的历史传统、社会制度、发展条件、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决定的,必然在共同特征的基础上形成鲜明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涉及公共利益的创造和制度化。全面深化改革是破解结构性问题的根本方式,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由经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全面深化改革重在推进社会公平正义,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究其根本,“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最主要的还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基础,需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系统改革思维为统领,形成体现社会主义制度—文化逻辑的总体改革观。全面深化改革作为复杂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体现社会主义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中国式现代化蕴含历史辩证法的总体改革观,正是通过系统集成来释放各项改革协调推进的正能量。从方法论视角看,中国式现代化基于整体实践在秩序建构上跳出简单二元对立思维,从线性的“两两关系”上升为总体性思维之“三三关系”(见表1)的总体改革观。

表1 当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结构要素

实践要素	集成关系	结构要素			秩序逻辑
		要素 I	要素 II	要素 III	
改革动能	三维驱动	改革	发展	稳定	总体性动态机制
改革场域	三元对象	市场	政府	社会	总体性实践领域
改革方法	三层互动	顶层设计	中层运作	基层创新	总体性集成机理
改革战略	三向规定	方向引领	问题导向	底线思维	总体性思想布局
改革路径	三重协同	整体推进	重点突破	过程衔接	总体性实施方略

其一,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动能”上,确立改革、发展、稳定的动态平衡结构。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建构一种活而不乱、活跃有序的动态平衡机制。改革是通过制度调适来化解矛盾的重要方式和推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国情实际,意味着必须从这一实际出发建构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总体秩序观。改革是为了促进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通过优化制度设计和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来实现人民群众之于美好生活诉求的公共秩序和社会福祉。良好的政治社会秩序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保障。基于发展与秩序的辩证关系,发展是具有未来前途的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过程,是化解矛盾和解决问题的根本之策。改革需要有重点的渐进式推进,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改革是优化体制机制和调整利益关系的秩序建构,旨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础上调整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宜的制度要素。全面深化改革不仅意指改革领域的全方位和多领域,而且意指改革作为发展动力兼顾秩序稳定的总体性设计。中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需要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的总体改革观。其中,政治发展和社会建设是公共利益创造及其权威性分配的核心,“在政治发展和现代化过程中,分化和日益增加的社会复杂性逐渐使共同体依赖于政治”^③。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是对社会良序的状态描述,动态稳定是优良公共秩序的质性表征。良好的社会秩序既是良法善制的结果,也是释放政道善治的动能,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内生性的社会资本。

其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场域”上,贯通市场、政府、社会的核心实践领域。全面深化改革重

①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第25页。
 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85页。
 ③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第257页。

在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取得总体效果,通过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增强国家战略宏观引导、统筹协调功能。政治作为对公共秩序的总体性建构和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涉及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和关键行业。“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①,通过制度设计调整利益分配关系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焦点。如果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②,那么,政治经济学正是通过联系生产力发展状况和上层建筑来考察生产关系形成、变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并直接影响其他领域的规则变革。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基于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及逐利性,需要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彰显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做到补位不缺位,到位不越位,保障经济秩序的健康运行和可持续发展。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需要通过贯通市场、政府、社会的总体改革来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增强宏观政策治理取向一致性和治理效能的聚合性。依法治国是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方略,重在确保公共权力运行的规范性,处理好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全面深化改革重在将各项改革纳入法治化轨道,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以善治理念和法治精神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应该既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呈现出活力和秩序有机统一”^③,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形成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和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生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场域上,以经济改革为牵引,以政府改革为保障,以社会改革为基础,形成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

其三,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上,坚持顶层、中层、基层的互动集成机理。全面深化改革作为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基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进行战略设计和总体布局,确保各项改革举措层层推进和协同发力。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全面领导是确保制度方向和激活制度优越性的根本保障。“随着改革不断深入,各个领域各个环节改革的关联性互动性明显增强,每一项改革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每一项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④。社会主义改革主要采取“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和“自下而上”的基层创新。在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全面深化改革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意味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一是顶层设计体现方向定位和总体设计,以保障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性和统领性。最大限度规避在“条块”分割的权力运行系统中形成上下一般粗的本本主义,以及基于部门本位主义而出现的政策走样或效能弱化。二是基层创新体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实践辩证法,为顶层设计和战略布局提供改革试点的经验样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激活基层创新动力,聚焦人民群众对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大关切推进改革创新。三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上,坚持顶层设计、中层运作、基层创新的有机互动,确保各项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一致性,以系统集成和效能释放形成改革促发展的战略目标。

其四,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上,确保方向、问题、底线的总体发展布局。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改革与革命具有一致性的内在规定,意味通过制度变革来实现秩序重构。从前提和目标上看,革命是“先破后立”的制度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

③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332页。

④ 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33页。

性重构,改革是在基本制度基础上对局部环节和要素的结构性优化,是坚持“先立后破”建构性思维的制度性优化。当代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是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治理体系。改革意味着对社会价值的结构性调整和利益的再分配,需要敢于涉险滩,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全面深化改革秉持科学的方法论,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谋划,破立并举、先立后破,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社会问题是社会矛盾的反映,改革是基于社会矛盾运动的制度化调适,重在运用矛盾辩证法来化解矛盾,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性问题。问题导向是基于问题倒逼,守正创新是基于底线思维的发展辩证法。守正意味着坚持制度方向和锚定发展目标,改革是在守正创新的基础上进行制度调适和规则优化,需要准确研判矛盾和评估问题,做出合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切合实际条件的对策方案。在战略上坚持改革方向、问题导向、底线思维的总体设计,以“立破并举”的发展辩证法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制度—文化逻辑上形成求解“时代之问”的“中国之治”。

其五,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路径”上,采取整体、重点、过程的协同实施方略。中国式现代化是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总体现代化,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方法。改革的场域和对象直接决定改革的战略布局和路径选择。市场、政府、社会作为改革的核心领域,一方面需要以系统改革思维来整体布局和统筹推进;另一方面需要聚焦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面来重点突破和过程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需要以现代化法治体系来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建立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为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提供丰裕的物质文化保障。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诸多问题,需要总体分析各领域问题的“问题链”和“矛盾源”,聚焦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采取整体、重点、过程的协同实施方略。全面深化改革意味着要敢于突进深水区,敢于啃硬骨头,需要重点突破,牵住牛鼻子,抓住主要矛盾和主要方面来实现系统带动效应。全面深化改革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性的系统工程,一是需要以自我革命的历史主动精神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突破掣肘社会公正的利益固化藩篱,为持续深化改革和高质量发展集聚新动能;二是以顶层设计确保市场、政府、社会领域改革的配套衔接,以重点突破来攻克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把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现代化的治理效能。

综上所述,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秉持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事业的“中国叙事”。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通过自主探索和改革发展形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在各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其中在制度—文化逻辑上蕴含系统集成的总体改革观和体现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之大逻辑的总体秩序观。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现代学”的方法论建构上实现了从“两两关系”到“三三关系”的系统集成和协同建构。比较而言,“三三关系”是一种去线性化和去平面化的立体结构,并基于时间意识和空间思维的动态优化模式。正是基于总体性改革思维和整体性的辩证实践,建构起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治理体系,为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奠基坚实的制度保障。

三、总体改革观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秩序观

总体改革观是基于复杂现代性和当代中国发展逻辑的实践辩证法。经典现代化理论以“元知识形态”塑造了“现代学”的话语体系,将现代化设定为一项普遍化的解放事业,使西方社会的全球扩张

成为合法化的意识形态。纵观西方“现代学”的叙事逻辑,在思维层面潜藏着地理范畴与历史范畴的“古今中西之争”,深刻影响了后发国家探索现代化的道路选择。西方国家作为现代化的先行者,试图利用先行发达的优势推行其民族利益扩张的殖民主义政策。“发达国家(西方)在全球化过程中,力图用自己的文化征服和取代落后国家的文化,要求把地理范畴(本土与西方)转换为历史范畴(传统与现代),以论证其合理性”^①。广大后发现代化国家主要是“从文化自保的立场出发,要求把历史范畴(传统与现代)转换为地理范畴(本土与西方),以消解其合理性,由此形成一种对抗性逻辑。”^②这两种思维框架中的话语之争,本质上是“诠释现代性”的思维立场与“重撰现代性”的身份之争。

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并联式”特点,需要建构全面现代化的总体秩序观。在现代化理论研究中,基于器物、制度、文化的分析从基本逻辑上阐明现代社会变革的基本面向,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但也存在明显的思维局限性。具体来说,一是现代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具有多重面向,基于单一要素的分析无以管窥事物作为结晶体的各个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显著的“并联式”特点,经济社会文化的变革是多维要素的时空叠加。二是现代性作为总体性的社会变革,器物、制度、文化是主要截面,并非全部要素的结构性分析。现代化既具有历时性的过程表征,也有空间性的多元要素的聚合特征。三是基于单一要素的深度阐释尽管体现“具体分析”的优势,但由于缺乏辩证思维而走向形而上学,这是因为器物或科技现代化中有文化因素的支撑,制度现代化需要法治文化和规则意识的支撑。文化现代化总是基于特定的社会变迁和制度变革,文化引领和道德治理需要以法治秩序为基础保障。

中国式现代化以总体实践观和总体改革观开创扬弃工业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工业文明社会对工具理性的推崇难免会引发单向度的发展悖论,生活世界的具体化确证有助于摆脱宏大叙事的窠臼,但由于总体性思维的缺失而导向社会有机性的技术肢解和单向度化的功能反噬,进而引发现代社会复杂性治理中的结构性危机。诚如“技术文明的外壳不能解决思想意识、精神文化这个文明内部核心中产生的根本冲突,人类生活的空间因为技术的发展而变得更加开阔,拥有更多选择,但也面临和技术文明伴随的价值观冲突、战争危险、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等多种威胁。”^③这些洞见呈现了西方现代性危机的基本面,也是对西方现代化之制度—文化逻辑的本质揭示。现代性以理性启蒙为先导,重撰现代性同样离不开人的理性自觉。因为“现代性首先是人的现代性,是人的思想认识到社会变革的目的所在,据之确定了行为所追寻的价值,从而按照这样的目的与价值来变革社会,并做出从经济、政治到法律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④。历史地调适自然秩序紊乱之生态危机,克服心灵秩序紊乱之信念危机,只能对变革的社会关系加以优化。

全面深化改革是以社会主义制度—文化逻辑“重撰现代性”的发展方式。发展是事物具有新质的内在递升,是基于矛盾辩证法的结构性升级。以改革促进发展是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赢得战略主动的必然要求,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要求。基于整体实践观和总体秩序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内蕴着当代中国发展逻辑的总体改革观,包括地位论、领导论、价值论、方向论、目标论、原则论、全面论、重点论、方法论、开放论等。整体实践观体现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总体改革观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文化逻辑,形成朝向人的全面现代化的总体秩序观。具体包括现代化目标、过程、动力、模式、制度化和评价标准,在人类文明进阶的未来

① 丁立群:《中西古今之争的前提批判》,《哲学动态》2019年第8期,第5—12页。

② 丁立群:《中西古今之争的前提批判》,《哲学动态》2019年第8期,第5—12页。

③ [德]阿尔弗雷德·韦伯:《文化的世界史:一种文化社会学阐释》,姚燕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2—13页。

④ 陈嘉明:《哲学、现代性与知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148页。

视野上重置了西方现代性的秩序逻辑。

其一,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秩序:实现物的丰富和人的发展的文明进阶。现代化伴随结构性的矛盾变迁,通过改革来化解社会矛盾是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中国式现代化是时空高度聚合的并联式现代化,是在实现物的现代化的基础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增进民生福祉是改革发展的根本目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①。全面深化改革聚焦人民生活品质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需要持续完善收入分配和就业制度,着力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核心是通过制度性改革形成实现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内生动力。一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形成“有效的市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二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形成“有为的政府”以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实现物的丰富和人的发展的文明进阶,坚持“有为的政府”与“有效的市场”相结合,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完备、稳定、管用的制度体系。

其二,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秩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生态秩序的底板。人直接地是自然的产物,是基于自然存在之前提的社会性存在。“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②。在以人的依赖性为特征的前现代社会中,由于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能力的有限性,不得已陷入为生存条件而斗争的历史性抗争中。经由蒙昧时代的自然崇拜到工业文明时代的自然抗争,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其中,以科技进步力量来征服自然成为人类走向现代性的理性标尺,一味地向自然界索取财富成为人类占有自然的生存意志。为生存而斗争的发展方式损坏了自然界之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承载力,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幸福叙事也就丧失了存在前提。这一意义上的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内在矛盾的结构性修复,本质上是对资本现代性之制度—文化逻辑的历史性革新。换言之,生态文明只能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式现代化将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和能量互动置于可持续发展的支撑秩序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现物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在人类生存和幸福叙事上形成具有未来视野的生态理性。这一生态理性是对资本文明之制度—文化逻辑的价值观变革,是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布局,以合理尺度创造丰裕物质文明和构建人类幸福的生态福祉。

其三,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外部秩序: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③。民族国家的现代化是通向“世界历史”的总进程,世界一体化是“世界历史”的总规定。然而,由资本逻辑推动的全球化具有双面性,意味着“全球化是一个多面向的过程,对于所有人的生活都具有深远影响,对个体和集体行动施加了约束并开放了机会”^④。资本逻辑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作为现代化的重要表征,尚不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438页。

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41页。

③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51页。

④ [意]艾伯特·马蒂内利:《全球现代化:重思现代性事业》,李国武译,第169页。

足以构成“世界历史”的内在规定。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国必须依靠改革创新来向世界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前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的世界格局。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依靠自主发展和改革创新形成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秩序保障。一是国家安全是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完善维护国家安全体制机制,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切实保障国家长治久安。二是坚持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相互促进、良性互动。聚焦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强化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和手段,有效构建新安全格局。三是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内蕴的制度—文化逻辑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的实践智慧。中国以和平发展的方式向世界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前景,既为人类走向现代化提供全新的道路选择,也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其四,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秩序: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就世界现代化的总体格局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世界繁荣稳定是中国现代化的机遇,中国发展也是促进世界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就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逻辑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坚持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相互促进来形成发展新格局新动能。一是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首要任务,是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全面深化改革,需要立足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新发展阶段,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以制度创新塑造实现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二是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重在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是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根本出路,旨在以更优质的物质文明夯实人类文明进阶的社会资本。在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常态语境中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重在以社会主义制度—文化逻辑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三是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支撑和精神动力。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引领时代发展的精神文明成果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在高质量物质文明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彰显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精神,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制度特质。

其五,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统领秩序:基于人类道义秩序的系统思维和总体治理。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致力于民族复兴和人类解放的崇高事业。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突出特点是发挥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①,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千秋伟业,以自我革命的方式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通过健全从严治党体系全方位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就领导和治理而言,党的领导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根本保障,需要聚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丰富各层级民主形式,把人民当家作主体现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需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激发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以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推进改革发展,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利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现代化的统领秩序源自中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53页。

中国共产党基于人类道义秩序的总治理,以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思维着力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在改革—发展方法上,以系统改革促进全面发展为集成进路,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在各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在制度—文化逻辑上,以优良社会关系建构为中轴,是辐射世界体系层、政治制度层、思维理念层的结构性再造,旨在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在思想—文明形态上,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目标,实现从物本主义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全面现代化,实现超越西方现代性的文明范式革新。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必然之路。中国改革发展的历史性实践赋予社会主义现代化以新的时代内涵,其中孕育的总体改革观和总体秩序观在人类文明进阶意义上超越了西方现代性的秩序危机。以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旨在恪守人类高阶现代化的制度—文化逻辑,以心—物秩序为中轴来复归人类文明的价值理性,以总体性改革来优化经济社会发展关系,以系统性的空间治理来规避现代性秩序困局。这些蕴含着未来学的思想要素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对“现代学”的理论贡献:一是在自然秩序的变革逻辑上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二是在社会关系的建构逻辑上坚持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的内在一致;三是在心灵秩序的总建构上坚持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机互成。这一实践智慧作为总体改革观和总体秩序观的内在规定,从人类道义层面不断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和文明向度。

Comprehensive Order Perspective: The Institutional-Cultural Logic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Liu Zhanhu

Abstract: Modernization is an inevitable path for China's entrance into world history, representing a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with temporal awareness in human historical progress that involves a profound reconstruction of order and meaning. Based on the unicity of modernity and the plurality of modernization,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structural changes of nation-states always entail a specific institutional-cultural logic. The themes of human social activity are survival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with the aims of modernization being a high-quality public order and a dignified, fulfilling life. On the survival level, this relates to social relations with natural order and objective dimensions, while on the happiness level, it concerns social relations with the mental order and subjective dimensions. The shared objectification relationship of both levels manifests as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and internal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in terms of order. Social practices based on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serve as the medium for reconstructing the order of modernity, while institution-culture is the crux for establishing a humane natural order and a natural mental order. Chinese modernization, as an innovative paradigm that rewrites Western modernity, nurtures a general order perspective in institutional civilization that fosters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Political philosophical analysis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reform perspective and a comprehensive order perspective helps clarify, from a holistic practical viewpoint, the structural transcendenc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over Western modernity, redirecting various growth-oriented development narratives toward comprehensive human modernization. It seeks to construct high-quality public order and dignified, fulfilling life through historical awareness of civilizational progression.

Keywords: Modernization; Institution-culture; Comprehensive Order Perspective; Comprehensive Reform Perspective; Chinese 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侯林莉]